
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

张广智

伏尔泰是举世尽知的世界文化名人，我国学术界对他是颇为熟知的。但是，时下评论伏尔泰，对其在史学上的业绩似乎很少有专文涉及。尤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伏尔泰历史著作的中译本不见有一部问世；新版《辞海》“伏尔泰”条中，对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和作品也只字未提^①。由此二例，足见我国学术界对伏尔泰在史学上的贡献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其实，伏尔泰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历史学家，历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创始人^②，他在史学上的卓越贡献对当时及后世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也是他蜚声文坛、称誉后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类遇到重大的转折关头，历史总会把一些杰出人物推到前台。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就是时代造就的。为了探讨本题，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及历史方面的著述，我们有必要略知其梗概。

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生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盛极而衰的路易十四时代^③。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伏尔泰称这个时代为“最接近尽善尽美的时代”^④。作者写道：“它把高尚的趣味带给德国；把科学带给俄国；它甚至使奄奄一息的意大利重新振作起来。整个欧洲在文明礼貌和社交风气方面的改变都应归功于路

① 《辞海》“伏尔泰”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一七页。

② 巴恩斯：《历史编纂史》，纽约一九六三年修订本，第一五二页。

③ 路易十四（一六三八——一七一五年），法国国王，在位共七十三年（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年），人称“太阳王”，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久的一位国王。

④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史》，见彼德·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纽约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八五页。

易十四的朝廷”^①。但是，与伏尔泰所讴歌的一片升平景象相反，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正在激化，沉重的封建压榨与大肆搜刮，加上路易十四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使得经济凋敝，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一七一五年当这位国王死去时，国债高达二十五亿法郎，其中四亿三千万必须立刻偿还，而国家的收入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万法郎，即仅为国库支出的十五分之一^②。在政治上，封建专制王权的残暴与教会势力的猖獗，给法国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蒙上了阴影。特别是到了路易十四朝末年，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残暴的封建王权，腐朽的宫廷贵族，肆虐的教会僧侣还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行将就木的旧势力总是要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甘灭亡的。

时代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土地上，新的因素和变革要求正在萌发、增长，各种社会力量与启蒙思潮也在集结、汇合，它如同冰层下的激流，一旦破冰而出，必将锐不可挡。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破重重阻力，正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并日益成长起来，且看：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已经得到了发展，大型的机器生产企业开始出现；对外贸易非常兴旺，仅十八世纪初的出口贸易额就增长了两倍；在东北地区，农业上亦出现了象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如此等等。阶级矛盾也日渐激化，农村的“饥民暴动”，城市“无套裤汉”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尤其是“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对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感到愤懑，他们一心想夺取政权。为此，他们迫切需要借助于喉舌为自己的合理性作辩护。弥漫当时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从法国发端了。就这样，封建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第三等级”的自由呼声，旧传统的死守阵地与新思潮的蓬勃兴起，交错杂陈，构成了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幅奇特而又多彩的历史画卷。

伏尔泰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漫长的一生，好象一面镜子，折射出他那个时代新旧两种思想、观念和力量的消长兴衰，并预示旧时代的必然崩溃和新时代的即将来临。正如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预言的：“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③

“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④。的确，伏尔泰的名字是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联系在一起。在占整个十八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他俨然以一位启蒙运动领袖和导师的身份，无情地鞭挞封建王权的黑暗统治，奋起抨击天主教会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持久且卓有成效的战斗，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尤其令人赞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史》，见彼德·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纽约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八五页。

② 罗琴斯卡娅：《法国史纲》，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四页。

③ 转引自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〇页。

④ 安德鲁·莫洛亚：《伏尔泰传》第二节。

叹的是，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活跃在这个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差不多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正因如此，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高尚的天才都追随着伏尔泰”^①，他仿佛成了欧洲知识界的“无冕之王”^②。由于伏尔泰的勤劳耕耘和漫长生涯，他一生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并涉及诸多领域的文化遗产。仅十八世纪末由博马舍汇集出版的他的第一个全集本，就有七十卷之多^③。在这卷帙浩瀚的作品中，也包括他在历史著述方面的丰硕成果。

伏尔泰的历史著作甚丰，举其要者，有以下几部。

《查理十二史》(Histoire de Charles XII)。此书写于一七三一年，是伏尔泰最早的历史著作之一。它主要记述北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④一生的事迹。此书的风格是笔调简洁、明快，用讽刺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好战的流氓国王”的形象，极富文学色彩。因此有些论者认为它是一部历史小说^⑤，实际上是一部属于稗史性质的人物传记。与伏尔泰后期更著名的历史著作相比，它还显得不够成熟。但作者在该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即：那种不讲理性、违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恣意发动侵略战争的黩武主义者，是一些愚不可及的蠢人，最终必将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这种反战思想是颇有进步意义的。

《路易十四时代史》(Siècle de Louis XIV)。此书从搜集资料到最终完成，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辛劳，系伏尔泰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历来为西方学者所推崇，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历史著作。西方学者之所以重视这部书，分析起来大抵不外乎是：与旧时传统的欧洲史学相比较，它所写的内容要广泛和开阔得多，给西方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虽用自己的主观愿望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国王形象，但该书无论如何不只是对路易十四个人的赞颂，而是包含着对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详尽叙述。他自己就声言过：“与其说我在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⑥。尤其是在该书中，作者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记载了这个被称为法国文化史上“黄金时代”的文学艺术，堪称为近代文化史之滥觞。其书因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迄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研究这个时代的权威之作，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

① 普希金语，转引自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二八页。

② 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伏尔泰”篇，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三六页。

③ 学术界一般认为最好的《伏尔泰全集》，却是于一八七七——一八八二年间在巴黎出版的莫朗版。

④ 查理十二(一六八二——一七二一年)，瑞典国王，在位期间(一六九七——一七二一年)四出征战，挑起战衅，曾发兵进犯俄国，被彼得一世率军击溃，窜逃土耳其，后来又归国重整旗鼓，再挑战衅，举兵侵略邻国挪威，最后战败死去。

⑤ 见科思敏斯基：《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莫斯科大学一九六三年版，第一九〇页。

⑥ 转引自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八三页。

以为，此书不仅为伏尔泰史学上的代表作，而且完全可以列入西方史学名著之林。

《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此书是伏尔泰避居西雷期间命篇的。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其书以视野极为开阔、立论独具创见和充满睿智而名闻后世。英国史家古奇称此书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新类型”^①。不管怎样，作者在书中努力要表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遇到过无数的错误和失败，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向着物质和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②。在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桎梏以后，出现了这样一部从题材内容到编纂方法都属全新的作品，如同在一座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一块石头，激起了千重浪，仅从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八年这短短的十多年间就再版过十六次，受到了欧洲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彼得大帝统治时代俄国史》(Histo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此书是伏尔泰晚年移居佛尔纳时的作品。在作者看来，彼得大帝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是一位天才^③。对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国所出现的变化，他不胜赞美，视为“奇迹”。因此，书中的彼得大帝是作为俄罗斯的伟大改革者和开明君主的形象而出现的。实际上，在该书中寄托着作者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开明君主”的明智，去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符合理性的社会。这当然是幻想！

此外，伏尔泰还撰有《路易十五时代史》(Siècle de Louis XV)和《巴黎议会史》(L'histoire du Parlement de Paris)等历史著作。

概言之，在伏尔泰的历史著述中，揆其用意，似乎体现了这样一个总的倾向：作者力图冲破旧史学的樊篱，显示了那个时代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他无意于为一国作志，却努力想描绘出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有时虽也为一人立传，其中却不难窥见整个时代。他对历史事件与各等人物所作的描述，不是平淡与抽象的，而是以文学家的手笔精心写成。立论新颖，哲理深刻，史料宏富，语言生动，读来视野开阔，妙趣横生，充分显示了他那不凡的史才。作者为此（当然也包括他在其它领域中所作的种种努力）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这些，总的来说，恰恰又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给予他的，也是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史学领域中的真实反映。

① 古奇：《历史科学的成长》，载《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英文版，第八一七页。

② 伏尔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转见《Nouveau Larousse》，第七卷，第一三四八页。

③ 参阅《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八七页。

二

伏尔泰对西方史学的建树，不仅以这些历史著作作为人类史学宝库增添了可贵的财富，更主要的还在于他通过史学实践所揭示出的史学理论，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就笔者看来，他在这方面的业绩，大体可归纳如次：

其一，他第一次打破了独霸西方二千多年的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为历史编纂学开拓了无限广阔的新天地。

历史编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应当着重记载人类生活的哪些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学，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就是：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为政治军事史。这种传统是从古希腊史家，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开始的。他所写的《历史》（亦名为《希腊波斯战争史》）大体上确立了以战争、并进而涉及战争中的政治为基本内容的编纂体例。不久，古希腊杰出史家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奠定了历史编纂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古罗马史学是沿袭古希腊史学前进的，就编纂内容上也是如此。在中世纪，西方史学被神学把持，在内容上当然不会超出神学教义和教会历史。文艺复兴时代，造就了一批新兴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不断摒除荒诞迷信和陈腐陋见，试图把史学从天上引向人间，但政治军事史的旧框框并未被冲破。随着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各国的蓬勃展开，史学变成了新旧教派斗争的工具，于是历史著作的内容则又集中到教会史方面，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伏尔泰所生活的时代^①。夏德莱侯爵夫人在请求伏尔泰用新的历史观点写作一部内容广泛的世界史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我在这种书中看到的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件，一大堆缺乏连贯性的琐碎事实，成千次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战斗……。我拒绝再看这些枯燥空洞的东西，因为它只会使智力疲倦而不会使智力有所启发。”^②这种感受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人士对那些陈旧历史著作的普遍不满。因此，在伏尔泰出生前的西方历史著作中，正如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归纳的：“还充满了僧侣的虚伪和朝臣阴谋的历史轮廓”^③。从古希腊时代至十八世纪，这种旧的史学传统已经统治西方达二千多年了。不冲破这个传统，不对历史编纂的范围另辟蹊径，西方历史学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

① 参看古奇：《历史科学的成长》，载《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一九三四年英文版，第八一六页。

② 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三五页。

③ 克罗齐：《历史编纂的理论与历史》，载《史学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下，伏尔泰出现了。

在伏尔泰看来，编写历史不仅限于政治军事，还应当包括广泛的内容，诸如农工商业、科学技艺、文学艺术、民情风俗乃至饮食起居、日常娱乐等等，总之，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记录，都应当属于历史编纂的对象。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史》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那些政治军事以外的事情，为扩大历史领域作出了范例。作者在其书一开篇，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并非为路易十四个人立传，其宗旨比这要广泛得多。我们力图为后人所描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活动，而是自古以来最开明时代里人们的精神面貌……。在这里，正象对以前几个世纪的描写一样，请读者不要期望在本书中会得到有关战争、攻城夺地和订立条约、割据土地的繁琐细节……。本书将只限于叙述值得所有时代注意的事情，描绘时代精神及风俗习惯，以便人们受到教益，并引起他们崇尚德行、喜欢技艺和热爱祖国。”^①因此，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包括了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作者巧妙地把战争进程和外交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作为背景，以烘托其书所要表达的主题：显示“自古以来最开明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面貌”。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他最先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领域。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史》充分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文化发展的日臻完美的辉煌成就，首开西方文化史之先河，其对史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伏尔泰不仅再次提出了撰写文化史的重要性，而且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把它当作一个新文化运动来进行探讨，使西方对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但在他之前，西方学者对这个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缺乏综合的叙述。及至伏尔泰时，他独具慧眼，把它放到西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研讨，使之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成果是意大利人的天才创造，而不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逃亡者的来临；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新。他的这种努力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文艺复兴运动铺平了道路，尤其为十九世纪中叶瑞士史家布克哈特的史学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问世，创造了理论前提^②。

由于伏尔泰对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和有力突破，他因而被众多论者称颂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化史的鼻祖^③。固然，历史编纂领域的扩大，文化史开始伸入到史学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史》，载《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前揭书，第二八四——二八七页。

② 参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齐思和之序言，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第二页。

③ 贝洛夫：《德国史学史》，载《史学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领域，归根结底，这是西方启蒙时代给予史学上的重大成就，但这功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伏尔泰。

其二，他猛烈地抨击宗教迷信，抛弃了神学史观，使史学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有力的思想武器。

中古欧洲基督教的宗教迷信是对人的理性的蒙蔽和禁锢，勇敢地向腐朽的宗教势力与荒诞迷信进行挑战，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伏尔泰也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斗士。法国是旧教国家。它的宗教势力盘根错节，基础深厚，与当时欧洲的荷兰、英国及其它国家相比，它不曾有过较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在伏尔泰所生活的年代里，僧侣与贵族并列为法国社会的特权等级，教会依然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可靠支柱。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对天主教会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有力斥责宗教迷信的愚蠢行为。他认为，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天主教是“最可笑、最荒谬和最残酷的”、是“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他指出，一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史”。在他眼里，教皇、主教、神甫都不过是一群“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①。他勇敢地提出了“消灭败类”的口号，向教会、教皇作斗争，并宣称“理性的日子来到了”^②。在这里，伏尔泰对宗教迷信与天主教会所作的批判，是以理性为衡量教义的是非，也是是否利于人的理性的发展来判断这种教义在历史上的价值，他这种对天主教的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对当时及后世无不发生深刻的影响。稍后，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两章中，对基督教所持的批判态度，显然是受到了伏尔泰的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把法国第一个唯物论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梅叶的《遗书》作了摘编，于一七六二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并秘密地运往法国各地散发。《遗书》中反宗教神学的思想在法国之广为传播，对启发民智、清除宗教蒙昧主义的毒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他并不赞同梅叶关于用革命暴力去推翻专制政府的政治观点^③，但他与《遗书》中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却是息息相通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伏尔泰没有停留在用猛烈的言词对宗教迷信与教会统治进行讽刺和攻击这一点上，他还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科学态度，把这种批判深入到历史领域，从而断然否定了霸占史学论坛甚久的神学史观。在西方，神学史观是由公元五世纪时的圣·奥古斯丁制定的。圣·奥古斯丁在《上帝国》（亦译作《上帝之城》）一书中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在冥冥的宇宙之中，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前进的每

① 转引自：《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五页。

②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版，第八八页。

③ 伏尔泰在一七六二年二月致达兰贝尔的一封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读它的时候，我吓得发抖！”

一步行动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①。从此，西方史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这种神学史观所束缚，宗教迷信代替了科学的探索，无知偏见取代了信史实录，史学开始沦为神学的奴仆与附庸。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这种神学史观受到了一次冲击。但这种冲击在法国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一六八一年，法国主教鲍秀埃编成《世界史论》。在该书中，他竭力鼓吹：无论世俗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都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②。这无疑是在圣·奥古斯丁当年神学史观的复活。伏尔泰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对《圣经》与基督教传统教义等作了历史的考察后，认为：《圣经》绝不是出于上帝之口而成的书，其中所载事实大多荒谬之至，不足为信，而基督教不过是犹太人吸收了当时各民族中多种宗教传说综合而成的产物。在伏尔泰那里，那种编造出来的人类历史是由上帝的意志安排的神学史观，除了趋于崩溃一途，难道还有其它结局吗？

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里，伏尔泰一反神学史观鼓吹者的说教，向当时的知识界人士指出：要破除宗教迷信的束缚来研究全人类的历史^③。他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前进，社会在不断发展，并终将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后到达一个理想的境界，而这与神的意志是毫不相关的。伏尔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和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这种乐观主义态度，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心理写照。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神话故事，《圣经》也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因为在伏尔泰看来，“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在起源上要比《圣经》上所说的早得多，而在地域上则远远超过了早年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所知道的那个地区。”^④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伏尔泰提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思想来代替神的意志控制人类命运的思想。这就是他所建立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思想。”^⑤伏尔泰这种对神学史观的摒弃，论者多认为是他史学上的主要功绩^⑥。

一般说来，史学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为历史而历史是不存在的。在启蒙时代，史学是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伏尔泰上述的那种批判精神，正是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这一斗争需要。在同时代的启蒙作家中，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读了他的历史著作后，非常高兴地给作者写信道：“其他的历史家叙述史事，只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您却是为了使我们从内心激起对说谎、愚昧、虚伪、迷信、宗教、狂热和暴政的憎恨。”^⑦伏尔

① 参看绍特威尔：《史学史》第一卷，纽约一九三九年版，第三六四——三七七页。

② 参看《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前揭书，“鲍秀埃”篇。

③ 转引自《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前揭书，第二八一页。

④ 转引自《史学家的业绩》第二卷，前揭书，第二八一页。

⑤ 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前揭书，第三九页。

⑥ 科思敏斯基：《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前揭书，第二〇二页。

⑦ 转引自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八一页。

泰在史上的战斗锋芒，无疑是西方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引起的重大回响，它深刻地反映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对正在消失的旧时代的历史批判，富有很大的进步性。

其三，他敢于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研究。

传统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总是喋喋不休地宣扬这样的观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应以欧洲为中心；基督教史家们更是鼓吹人类的历史不能逾越《圣经》所涉及的范围一步，在他们的笔下，完整而丰富的人类历史仅仅成了希腊、罗马、地中海东岸以及北非埃及等少得可怜的几块地方的编年史。这种以民族偏见与《圣经》教义糅合在一块而编织起来的世界史体系是荒谬的。前述鲍秀埃的《世界史论》便是用这种体系炮制出来的典型。伏尔泰不屈于这种传统的陈腐见解，他以史上革新者的姿态凛然崛起，斥责鲍秀埃等人只注意描述几个早已从地面上消失的民族历史，而恰恰忘记了整个世界。

在伏尔泰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则它在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早在一七三三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表露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欧洲各民族不再互相轻视，而能够深入地考察研究自己邻居的作品和风俗习惯，其目的不是为了嘲笑别人，而是为了从中受益，那么，通过这种交流和观察，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人们曾经如此徒劳无益地寻找过的共同的艺术欣赏趣味来。”^①伏尔泰确实感到，在艺术上要找到一种为各民族共同欣赏的艺术情趣，需要开拓视野，排除偏见，对各国的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那么，历史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试论从查理曼大帝起至路易十三世为止的国民精神和道德以及历史上主要的事实》一文中，他看到了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共同特点，并认为在这种共同性中将展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历来被众多研究家看作是“第一本从世界历史观点来写的世界史”^②。在书中，伏尔泰给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历史以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阿拉伯、印度、波斯人的历史作了描述。“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③这个记述生动地揭示出他对欧洲之外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在西方传统历史编纂学所撒下的重重浓雾面前，伏尔泰能廓清迷雾，认准方向，把人类文明史当做一个整体加以通盘考察，然后落笔成书，进行综合编纂，这充分显示了他具有敢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框框的勇气与纵横捭阖处理史事的卓越才能。

伏尔泰非常重视东方各国的文化。他常常把东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借以说明西方

① 转见伍孟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二五——三二六页。

② 瓦·索柯洛夫：《伏尔泰》，前揭书，第三八页。亦可参看《Nouveau Larousse》第七卷，第一三四八页；科思敏斯基：《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前揭书，第一九二页。

③ 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前揭书，第三八页。

文明多么依赖于东方，东方诸民族在欧洲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多么巨大的历史作用。例如，他说东方各国的文化，就时间来说，都要早于《圣经》中所说的犹太人的文化。伏尔泰尤其崇拜中国古老的文化，他曾在一七五五年，由于受到中国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孤儿》^①的剧本，作者称赞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它能使富于侵略的成吉思汗，被古老民族的优秀文化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在他所编纂的史著中，更不乏许多中国历史上的实例。例如，他认为，中国的法规贯穿着崇高的和宽恕的道德，并说“孝道是中国社会的基础”^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应该是“天生在我们心中的自然道德的基础”^③。他还指出，孔子是宽容的自然神论者，并且盛赞儒家思想在中国开明政治中的作用^④。虽然这些说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诸多不合，而且在理论上也未必恰当，但伏尔泰的原意却是力图从中国儒家学派所宣扬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一种医治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救世良方，应当说，作者的这种努力与探索还是非常可贵的。

诚然，伏尔泰能把历史当作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的思想与做法，是与当时的时代条件有关的。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通往东方各国新航路的开辟，从十六世纪以来，世界之窗一扇一扇地在西方人的面前打开了，他们开始对世界各地，特别是对东方世界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编纂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各种条件随之具备。虽然在伏尔泰之前，西方就流行着许多五花八门的探险记，各国见闻之类的书籍，这些读物对打开欧洲人的眼界不无裨益，但尚流于支离破碎，缺乏对东西方历史的整体研究。一俟伏尔泰涉足历史学，正如美国史家汤普逊所指出的，“他是第一个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学者，并把世界各地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心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了对人类生活有意义的各个方面的情况。”^⑤这段评论，也许可以作为本节所阐述的伏尔泰在史学上杰出贡献的一个小结。

三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西方思想领域里的又一次伟

① 《赵氏孤儿》写的是春秋时代的故事，伏尔泰读了它的法文译本后，动手写《中国孤儿》，写的是成吉思汗的故事。

② 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史》。

③ 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前揭书，第三三页。

④ 近吴于廑先生在《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一文中，认为：伏尔泰之所以称道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赞同开明专制的眼光，来看待当时他所能知道的中国。此文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一四二页。

⑤ 汤普逊：《历史编纂史》一九四二年纽约版，第六六页。

大变革。从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来说，它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启蒙运动之于本阶段的西方史学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在这关系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伏尔泰所起的进步作用与存在的不足。

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是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这位法国哲学家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就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方法，认为理性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①，所以他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以扫除一切旧的传统偏见。到了十八世纪，理性的批判精神已经深入到一切领域。不过，启蒙运动时代的所谓的理性，不只是指我们在通常的哲学术语中与感性相对的另一种认识方式。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常成为一种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理性”条中，即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和“人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的一系列真理”^②。其时，那些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纷纷揭橥理性主义，无情地批判一切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力图使人们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对此，伏尔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人类精神革命的前夜。”^③其所以是一场革命，因为“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④作为这个时代意识形态之一的理性主义史学，也必将带有启蒙时代的深刻印记。

理性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崇拜抽象理性，将理性的力量说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吴于廑先生对之曾作过这样概括，“他们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⑤在伏尔泰等理性主义史学家看来，理性的力量被视为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的灵丹妙药和唯一力量。这就过分夸大了思想意识的力量。人类历史不可能象伏尔泰所归结的是什么理性同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作斗争的历史，也不能以理性为主线来贯穿始终，因为理性不可能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伏尔泰等理性主义史学家还没有认识到，“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的力量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① 笛卡儿：《方法谈》，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五年版，第一三七页。

② 载《狄德罗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四页，转引自《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前揭书，第三辑，第一五八页。

③ 转引自《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前揭书，第三辑，第一五八页。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五六页。

⑤ 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一三五页。

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

尽管从总体上考察，理性主义史学家仍然脱离不了唯心史观的窠臼。但是，理性主义的史学观点，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是对反理性的神学史观的有力否定，而且比起前阶段人文主义史学家也是一大进步。他们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种历史认识比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仅满足于探讨所谓人的价值，要深刻得多了；他们努力开拓历史学的新天地，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列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之中，并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这与人文主义史学家大多局限于编撰一城一地的地区史形成鲜明对照^②；此外，理性主义史学家在同封建神学史观作斗争时，已不再需要打着复兴古典史学的旗号，因为他们的羽毛日丰，可以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公开的鼓吹了。因此，理性主义史学在当时反对宗教神学以及进而为资产阶级大造舆论、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中，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不同阶段尤其是前后相衔接的思想文化运动，常有着某种合乎逻辑和历史的联系。如果说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潮是昔时人文主义思潮在新条件下的继续，那么，这时的理性主义史学也是对彼时人文主义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其实，在以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武器方面，在努力使史学世俗化并开展对神学史观的批判方面，在致力于探讨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试图写出可信的历史著作等诸多方面，理性主义史学都是继承了人文主义史学家的历史成果的。不过，与前人相比，由于时代的进步，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把人文主义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理性主义史学阶段。在这中间起主要作用的当首推伏尔泰。

作为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奠基人，伏尔泰与他的前辈人文主义史学家相比，最大的功绩是把哲学或理性精神^③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伏尔泰曾这样主张过：“历史只应全部让哲学家去写”^④。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例的哲学。就象化学中的一种催化剂放入溶液，会使液体发生奇妙的变化一样，伏尔泰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使西方历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美国史家绍特威尔称伏尔泰“确为历史开一光明之路”^⑤，也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史上，他是开辟这条道路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八九页。

② 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都竞相编写过佛罗伦萨城的历史。

③ 在理性主义史学家的笔下，哲学与理性几乎是同义词。所以，他们常称自己生活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或“哲学的世纪”。

④ 转引自《史学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⑤ 绍特威尔：《西洋史学史》“附录”部分，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中文版，第三七九页。

的一个人。这正如后来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所指出过的：“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放到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①

人们通常认为，卢梭、狄德罗与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三大领袖。伏尔泰与其他两人相比，论政治思想他当不如卢梭那样激进；论哲学观点，他尚不及狄德罗那样深刻。但是，就史学言，前两人则稍逊于后者矣。伏尔泰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没有无懈可击的历史学家。伏尔泰亦然。例如，他虽然跟宗教势力与迷信行为作斗争，并把上帝从历史著作中赶了出去，但他依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承认作为自然的最初推动者和立法者的上帝是存在的。说什么，“只要我们一考察最根本的原理，我们就必须求助于神。”^②这固然因为面对当时强大的宗教势力，他需要采取在自然神论的隐蔽下，攻击天主教这样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更在于他当时还不能用其他方式去解释世界的起源和世上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所以，当他陷入困境时，他不得不求助上帝，甚至说什么，“如果没有上帝，也应该虚构一个”^③。其后的“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则抛弃了“自然神论”，公开树立了无神论的旗号，较之伏尔泰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又如，他对中世纪历史采取了极其蔑视的态度。他说中世纪是“黑暗时代”、“野蛮民族的野蛮史”，认为早期中世纪的历史更不行，象狼与熊一样，是不值得研究的^④。他这种把中世纪历史一笔抹煞的做法也是偏激与失之武断的。再如，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虽然也同情贫苦的人们，但同时又害怕他们的觉醒，所以，他惊呼过，“如果庶民都议论起来，一切就都完蛋了。”^⑤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既要反封建又害怕人民的心理反映。伏尔泰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常把政治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开明君主”的身上，期望能通过这些“大人物”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来改变封建制度。他曾结交了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相信他们的明智能足以改变国家的旧制度，有利于一个符合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所以他说过，“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英明政策指导人类沿着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发展。”^⑥在他看来，按理性行事的专制之君，要胜于那些无知的、易受蛊惑的民众。所有这些都是伏尔泰所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温和的政治立场与保守思想的具体表现。

① 转引自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八〇页。

② 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前揭书，第六四页。

③ 转引自罗琴斯卡娅：《法国史纲》，前揭书，第七〇页。

④ 参看古奇：《历史科学的成长》，前揭书，第八一八页。

⑤ 转引自《政治学说史》中册，法律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七页。

⑥ 转引自勃·姆·别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三六页。

同十八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样 他也“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①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在思想上还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对此,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在论及伏尔泰的历史地位时,曾这样指出过:“伏尔泰是一个从罗可可式香气氤氲的大厅里向着新时代打开门户的旧时代的贵族。”^② 真是一语破的,准确地揭示出了伏尔泰作为一个坐而论道的知识界贵族的生动形象。

但是,伏尔泰对当时及后世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本国及那时的英、德等欧洲国家,到处都有他的门生和追随者。如法国的康多塞、英国的罗伯特逊和吉本,都是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派的传人。吉本在一七五七年赴欧洲求学时,曾慕名专程前往法国拜访过伏尔泰,直接受到过这位当时早已名闻遐迩的启蒙运动大师的教诲,并称颂伏尔泰是“当代最出类拔萃的人物”^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本所撰写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正是其师理性主义史学思想滋润的结晶^④。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就历史专业人才的茁壮成长、历史著作的大量问世,还是历史辅助学科的陆续建立及浩瀚史料的整理出版,与十八世纪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学的世纪”^⑤。前人播种,后人收获。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巨大进步,难道不包含伏尔泰的心血吗?如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史学理论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一时期史学上的代表人物米细勒、米涅、梯也里、基佐等实际上都是沿着伏尔泰当年所开辟的方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当然不是革命导师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它不仅是时代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必然产物,也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⑥的结果。伏尔泰在十八世纪史学上的这种探索不也为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吗?

斯人已逝两百年,西方史学多变迁。从伏尔泰逝世至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已经走完了整整二百多年的路程,其间名目繁多的史学理论与五花八门的史学流派汇聚在一起,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与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交织在一块,象一只万花筒那样,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光怪陆离的画面。这中间,有优秀的精华可供我们借鉴与继承,也有必须予以扬弃的糟粕。对伏尔泰的史学,亦应作如是观。但如果站在历史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七页。

② 转引自《伏尔泰评传》,前揭书,第二二页。引文内所指“罗可可式”,最初系指一种建筑(或家具)式样,以外形富丽堂皇,装饰精巧奇特著称,开始于法皇路易十四时代,盛行于十八世纪中叶。后来该词用于其他艺术部门,引伸为一种绚丽浮华的风格,它表现了上层资产阶级的艺术情趣。

③ 见《吉本自传》,万人丛书本,第七七页。

④ 对此,可参看拙作,《爱德华·吉本》一文,载《世界历史》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⑤ 参看《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六页。

⑥ 《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六二页。

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评论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功过得失，并鸟瞰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全部进程以后，我们将无偏见地用如下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作为西方文化史的开山祖，作为欧洲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创始人，作为近代西方第一位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伏尔泰应具有毋庸置疑的杰出地位，他在史学上的业绩，也与其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成就一样，都将永远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发出夺目的光辉。

[本文作者张广智，一九三九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撰有《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等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要目预告

论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新型经济形式		林子力
小潭公社的“统一经营，包干到户”责任制(调查报告)	张雨霖 杨承训	郭西萍
论指令性计划制度	王忍之	桂吉鏞
从制约因素论证两大部类发展速度对比关系		龚金国
论绝对地租与农业有机构成高低之间的关系		朱剑农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		钱学森
社会科学研究定量方法		宋健
论唯心主义这朵生长在人类认识树上的无果花		单少杰
论我国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张志愿
国际法中的刑事管辖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林欣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党性的几个问题		卫建林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		刘世德
学术动态 文学所召开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		杨志广整理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		李家一
论文摘要		
图书评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出版